周恩来武汉搞统战

刘明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同年年底，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武汉期间，周恩来战斗在统战工作的第一线，积极宣传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进步人士，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埃德加·斯诺

领导出版《新华日报》

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在武汉获准注册出版、公开发行。《新华日报》由于积极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界的抗战言论，歌颂英勇杀敌的抗日将士，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战，迅速成为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联系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桥梁，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2月份就发行了1万多份，四五月间达5万多份。

《新华日报》创刊刚刚7天后，就有数十名国民党顽固派指使的特务、暴徒，手持铁棍、利斧来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的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临危不惧，一面指挥《新华日报》正常出版，一面组织力量谴责暴徒、向群众揭露真相，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要他设法制止此类行径的再次发生。

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武汉会战拉开帷幕。同日，《新华日报》发表《保卫大武汉》的社论。6月15日，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具体地阐述了保卫武汉和有效地开展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意见》指出，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于第三期抗战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的影响，我国人民应该发扬西班牙兄弟保卫马德里的精神那样来保卫大武汉。

这份《意见》对于促进蒋介石坚持抗战，进行武汉保卫战，以及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10月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周恩来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该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做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一旦武汉停刊，重庆马上接着出报。

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汉沦陷前一天，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以坚定的口吻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在紧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大无畏的气概和掷地有声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通过阳翰笙等同志的积极活动和广泛联络，经过充分酝酿，正式成立了由各阶层组成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组，周恩来邀请作家老舍出任"总务主任"。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当天，周恩来以名誉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

会后，被推举为文协理事的冯玉祥在普海春大饭店设宴招待与会者，五六百人欢聚一堂，那种团结向上的热烈气氛，即便是在1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令冯玉祥兴奋不已，他写道："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不仅使文艺家们有了自己的组织，而且使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一致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5月中旬，周恩来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后来在会务报告中对这次会议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儿工作。他说，必须设法给文协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写些文章，使会务有更大发展。最后（他眼中含着眼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各协会纷纷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也分散到前线、农村、工厂去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著名演员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都起到了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开展海外统战工作

在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以前，中国共产党同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周恩来等到武汉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使节、各国记者，一些外国团体和人士频频到访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为了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由王炳南负责的国际宣传组，由周恩来领导。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泼斯坦、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于1938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贝特兰1939年出版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3月和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写到了这两次会见。他认为："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初，由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中国。一天深夜，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他会见，并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听到白求恩急于"上前线"的要求后，周恩来立即嘱咐王炳南为白求恩做出安排。考虑到当时日军正自华北向南进犯，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本军机轰炸扫射。周恩来建议白求恩先北上延安再前往前线。白求恩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先到延安，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

9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汉口，他们中有柯棣华、爱德华、巴苏等医生。10月初，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巴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我们去看望周恩来，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部分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着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全国发动群众抗击敌人。"

几天后，巴苏与柯棣华再一次见到周恩来。巴苏在日记里满怀敬意地写道："在盛大宴会上，我们全体再次见到了叶剑英和周恩来。""我有机会从很近的地方观察他。他吸引我的，是他那机敏、聪慧和富于同情感的目光。安娜说，20年后，我们将会为曾经与他结识而感到骄傲。我补充道：'干吗这么晚呢？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

此后，医疗队在各地都坚持为伤员治疗，1939年1月22日，医疗队前往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林伯渠赴沈阳迎接民主人士

刘晓可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8年冬，解放战争胜利在望。11月3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领导同志："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林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西北局于11月7日回电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

1948年12月16日，林伯渠告别了战友，乘汽车离开延安。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同志以及各界群众都赶来送行。经过11天的长途跋涉，林伯渠于12月26日下午抵达河北平山西柏坡。

林伯渠到达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分别进行会晤，充分交换意见。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金城、申伯纯、周子健等遵照周恩来要求，由李家庄前往北平安排接待工作。林伯渠出发前，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具体问题。

2月14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经石家庄、深县，取道天津北上，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30多人。他们都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许多地方陆续来到东北的。林伯渠到沈阳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领导同志研究了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下榻在那里的民主人士。

19日，李富春召集在沈阳的民主人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词，表示对中共中央的衷心感谢，并商定于23日启程赴北平。

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士频繁接触，向他们介绍情况、分析形势，阐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解答他们的疑虑，同时听取了他们许多好的意见，进一步增进了共识。

2月23日午后，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乘火车离开沈阳，于翌日晚抵天津，25日抵达北平。中共北平党政军领导、各界民主人士以及全国学代会代表、铁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到车站欢迎。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榻。26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各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热烈欢迎从东北、天津等地来北平及留平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林伯渠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由于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林伯渠同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面商，请他对民主人士"政治生活的充实问题多加关注"后离开北平，赶往西柏坡。

"老虎团"围点打援歼敌寇

周二中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王必成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同年冬接任第二团团长。其间，他参与指挥多次战斗，连战皆捷，威名远扬，被茅山根据地群众誉称为"王老虎"，所率第二团被称为"老虎团"。

1939年秋，日军为巩固江苏省南部占领区，维护其长江下游的交通运输安全，从常州抽调1个大队的兵力，会同镇江、丹阳等地日军守备部队，向丹(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进犯。为打破日军的企图，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北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沿镇(江)澄(江阴)公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陈巷桥是今江苏省常州市西夏墅镇的一座桥，位于孟河之上。镇澄公路经过陈巷桥。当地日军经常向以访仙桥为中心的丹阳一带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犯。9月8日上午，二团就在西夏墅与日军交火，打死打伤敌军40多人。为了夺取更大的胜利，王必成率领"老虎团"三营和特务连从丹阳出发，急行军两个多小时赶到西夏墅镇陈巷桥。

当天刚好是白露节气，即农历七月二十五。晚上有些凉意，但"老虎团"指战员个个热情高涨。王必成一面指挥部队在公路上设置好路障，阻断交通，一面对指战员进行动员和部署——两个排埋伏在西陈巷村东侧担任正面阻击，两个排埋伏在陈巷桥至安桥公路之间两侧圩埂上担任侧击，并派3挺重机枪埋伏在公路西侧的圩埂上，准备以密集的火力打击敌人；团侦察排和营侦察班埋伏在桥南侧担任侦察任务和尾击，另派一个排在河东土埂上防止敌人越河逃窜，同时派哨兵在地方抗日武装的协助下，在安桥至陈巷桥一线警戒，封锁消息。

各部战士就位后，王必成命令一部兵力袭击西夏墅据点，诱使敌军出援。晚10时，战斗打响。特务连两个排由北向南，一个排由南向北，以"围攻"的架势向西夏墅镇敌据点发动猛烈进攻。战斗进行了1个多小时，据点敌军一面顽抗，一面向周边敌人求援。

常州城内敌人收到求援情报后果然中计，立即向西夏墅据点派出援兵。深夜11点多，满载全副武装日军的7辆卡车进入伏击圈。敌人车队开到"老虎团"设置的障碍石前，只得停车。日军纷纷跳下车，企图借助车灯的亮光搬掉障碍物。见战机已到，王必成在土埂后一挥驳壳枪，喊声"打！"战士们顿时将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慌忙胡乱开枪迎战，依托路旁沟坎和汽车顽抗。

在王必成的指挥下，"老虎团"指战员乘黑夜勇猛出击，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很快焚毁7辆汽车，消灭了包围圈里的敌人。战斗结束后，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并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胜利返回驻地。此战，"老虎团"毙伤日军180余名，缴获手枪2支、步枪20余支、指挥刀5把，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品，取得了一场围点打援胜利。

北平和平谈判中的黄绍竑

贾晓明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败亡已成定局，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李宗仁任代"总统"。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企图以"和谈"为名，调整力量，伺机反扑。李宗仁迫于形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以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在北平（今北京）举行和谈。李宗仁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进行和谈。4月1日上午，黄绍竑作为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之一，陪同首席代表张治中乘飞机抵达北平。

抵达北平后，双方代表按既定办法，首先进行个别交谈。根据安排，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为了推动和谈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也分别与南京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会谈。他邀请黄绍竑、刘斐到香山当面叙谈。当二人乘专车到达北平香山时，毛泽东站在门口迎候，并热情地迎上前和他们握手，笑着说："欢迎两位和平使者的光临。"

双方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黄绍竑等到北平的生活情况。当谈到和平协定方案时，毛泽东问："这个协定你们觉得如何？李宗仁会同意吗？"黄、刘二人都表示尽自己最大努力做李宗仁的工作。随后，毛泽东留二人吃饭。席间，毛泽东对黄绍竑说："听恩来说，季宽先生很会填词，我也是个好结识诗人词友的诗词爱好者，怎么样，我们不妨来一首？"黄绍竑回答说，他此前也曾拜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那种雄浑洒脱的风格，是当今诗坛中无人能与之相比的"，他自己也曾填词，只是"聊以寄怀"，并提议"待协定签字完了，定向主席讨教"。毛泽东爽快地回答说："好，那我们一言为定！"

4月13日，和谈进入正式会谈阶段。谈判中，中共方面还主动提出，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其间，黄绍竑明确表达了希望达成和平的愿望。16日，双方拟定了协定的全部文本。张治中特派黄绍竑、屈武回南京说服李宗仁签字。

16日，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文件乘专机前往南京。临行前，周恩来乘车赶到机场，专门会见黄绍竑和屈武，勉励他们努力完成这项使命，并叮嘱他们："请你们转告南京方面，协定签字，应该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

黄绍竑和屈武回到南京后，立即把和平协定文本交予李宗仁。李宗仁听了黄绍竑的报告和看了《和平协定》后，沉默不言，而白崇禧在旁气冲冲地说："谈不成就打！"黄绍竑立即反驳说："能打得过共产党我们还用得上谈吗？"李宗仁召集桂系将领和亲信开会讨论。会上，黄绍竑谈了他希望达成和平的愿望，并传达了中共给予桂系的特殊优待条件。

白崇禧仍然态度强硬，李宗仁犹豫不决，其他桂系将领也莫衷一是。蒋介石拒绝《和平协定》的消息传来后，李宗仁再次召集桂系将领开会，讨论决策。黄绍竑在会上再三强调，应该接受和平协定，但白崇禧顽固坚持"划江而治"的立场，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不欢而散。黄绍竑给在北平的代表团打电话说明情况后，便动身前往香港。

随着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统治霎时土崩瓦解，黄绍竑在香港不避风险，出面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引起强烈响应。8月13日，黄绍竑等人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联合44名国民党人士，领衔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介石彻底决裂，"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此后，黄绍竑等人又联名发表了《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全体国民党将士弃暗投明，实现局部和平。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黄绍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加以通缉，并派特务到香港刺杀黄绍竑。由于中共秘密战线的同志采取保护措施并及时将黄绍竑转移，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9年9月，黄绍竑在中共驻港负责人的安排下，从香港赴北平。

临城敌工战线上的"攻心专家"

梁银安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张化民，河北省临城县北高村人，农民家庭出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委派，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化民先后担任临城县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太行一分区敌工站站长，从事对敌政治宣传、策反及情报搜集和分析等工作。他经常深入敌伪统治区，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建立秘密关系，并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方法，开展卓有成效的对敌宣传教育工作，争取了相当数量的伪军及伪组织人员投诚反正，被临城抗日军民称为"敌工战线上的攻心专家"。

1938年，临城盘踞着一股土匪武装。张化民发现，这股土匪中的大部分青年属于"被逼入伙"，于是化装打入土匪内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做通了大部分青年的工作，并通过他们把土匪头目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久，张化民率地方武装包围了这股土匪，在内应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罪大恶极的土匪头目和少数顽固不化分子，并将大部分青年吸收进抗日武装。

1943年，受组织上派遣，张化民来到临城水峪村敌人据点，做瓦解伪军的工作，在他的影响下，驻守据点的百余名伪军携带武器投诚。

1945年1月，张化民带领侦察班几名战士化装前往临城县白牛寨炮楼做瓦解敌伪工作。由于敌人突然换防，地下关系无法及时接应，张化民不幸被捕，关押于临城日伪军前方总指挥机关所在地。

被捕后，张化民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开口泄露任何党组织的秘密。不久，敌人把张化民的家人抓入监狱，企图从他们身上找出突破口。但几位家人与张化民默契配合，使敌人的这一诡计落空。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张化民患上了肺结核，但他依然不失时机地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向狱卒甚至审问他的特务开展整治攻势，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述抗日即将胜利、与人民为敌就是死路一条的道理，让不少人受到教育。同年8月，党组织领导的越狱成功，张化民被搭救出狱，回到抗日根据地，任中共太行一分区敌工科长。其后，多名在狱中受到张化民教育的伪军、特务携带武器来到根据地投诚。

临城解放后，张化民当选为第一届人民政府县长，领导了全县的锄奸、反特、土地改革、发展生产运动；1948年任中共邢台地委组织部干部科长、中共邢台地委统战部副部长。1952年5月23日，张化民由于积劳成疾，在邢台逝世，终年48岁。